

第 一 章

莫怪无心恋清境，已将书剑许明时

——蜀中生活及创作

一、名号不少 家世难明 生地未定

李白，字太白。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云：“惊姜之夕，长庚入梦，故生而名白，以太白字之。”

其名号甚多，兹略述如下：

唐人平辈之间习称行第，太白行十二，故时人称之为李十二。如王昌龄有《巴陵送李十二》诗，杜甫有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诗。

天宝初，秘书监贺知章与白相遇于长安紫极宫，既奇其姿，复赏其文，称之为“谪仙人”。见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、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。故世称“李谪仙”。

天宝初，曾奉诏入翰林院，时称“翰林待诏”或“翰林供奉”。亦见以上诸序文。故世称“李翰林”或“李供奉”。

天宝中期，一度奉佛，曾自号“青莲居士”。见《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》诗。故世称“李青莲”。

代宗广德初，拜为左拾遗，时白已没。见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（简称《李白新墓碑》）。故世亦

有称其为“李拾遗”者。

李白家世情恍难明。王琦所撰《李太白年谱》云：“据太白诗文自述，系出陇西汉将军李广后，于凉武昭王为九世孙*。当隋之末，其先世以事徙西域，隐易姓名，故唐兴以来，漏于属籍。至武后时，子孙始还内地，于蜀之绵州家焉。因通其邑，遂以客为名，即太白之父也。”此段介绍，虽有所本，但疑问亦多。有清一代，似无人注意及此。近世以来，始有异说，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，胡怀琛、詹锓、俞平伯等人随继其后。新中国建立以来，亦不绝如缕。八十年代以后，异说尤多，层出不穷，迄今未已。

其家世，出于其本人所述而为当时亲友所记载，并流传至今者，主要有以下二《序》，兹摘其有关段落如下。

（一）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云：

李白，字太白，陇西成纪人，凉武昭王暠九世孙。蝉联珪组，世为显著。中叶非罪，谪居条支，易姓与名。然自穷蝉至舜，五世为庶，累世不大曜，亦可叹焉。神龙之始，逃归于蜀，复指李树而生伯阳。

阳冰，白之从叔，晚途知己。宝应元年（762）为当涂县令，白从军半道病还，往依之，枕上授简托其为序。

（二）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云：

* 凉武昭王，讳暠，字玄盛，系出李广之后。当东晋安帝之末（418），为群雄所奉，推为敦煌太守，遂启霸图。兵不血刃，坐据河西五郡，国号曰凉。在位十八年薨，谥曰凉武昭王。（详见《晋书》卷八十七李玄盛传）

公名白，字太白，其先陇西成纪人。绝嗣之家，难求谱牒。公之孙女搜于箱篋中，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。纸坏字缺，不能详备。约而计之，凉武昭王九代孙也。隋末多难，一房被窜于碎叶，流离散落，隐易姓名，故自国朝已来，漏于属籍。神龙初，潜还广汉，因侨为郡人。父客，以逋其邑，遂以客为名。高卧云林，不求禄仕。

传正其父范伦与李白为挚友。宪宗元和十二年(817)，传正为宣、歙等州观察使，访白亲属于当涂，遵照白之遗愿改葬青山，并为其新墓碑作序铭。

其家世，出于其本人所述而见诸诗文者，兹摘其有关段落如下。

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云：

白本家金陵，世为右姓，遭沮渠蒙逊难，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，少长江汉。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。轩辕以来，颇得闻矣。

此《书》作于开元十八年(730)，李白时年三十岁，赘于安州许氏，为故相许圜师孙婿。

《与韩荆州书》云：

白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。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；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

此《书》作于开元二十二年(734)，时李白三十四岁。韩荆州即韩朝宗，以荆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，白往谒之，并作此书以上之。

《赠张相镐二首》其二云：

本家陇西人，先为汉边将。功略盖天地，名飞青云上。苦战竟不侯，当年颇惆怅。世传崆峒勇，气激金风壮。英烈遗厥孙，百代神犹王。

此诗作于至德二载（757）十月，时白因“从璘”事避难宿松。张镐，天宝末右拾遗，玄宗奔蜀，镐间道扈从。肃宗即位，玄宗遣之赴灵武，奏议多有弘益，旋拜相。

此外，李白家世亦见于《新唐书》本传，传云：“李白，字太白，兴圣皇帝九世孙。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，神龙初，遁还，客巴西。白之生，母梦长庚星，因以命之。”所谓“兴圣皇帝”即凉武昭王李暠（玄宗天宝二年追尊）。显系取材于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与范传正《李白新墓碑》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谓白为山东人，父为任城尉，因家焉。误。

以上记载，即李白家世之原始根据。因其讳莫如深，措辞含糊，互相矛盾，甚至不知所云，遂使后世欲探其究竟者，派生出种种说法。兹择其要，略志如下：

一种认为：碎叶、条支在唐太宗平焉耆，高宗平贺鲁，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后，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。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，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。其父之所以名客者，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，因以胡客呼之。太白至中国后方改姓李，则其家之本为西域胡人，绝无疑义。见陈寅恪《李白氏族之疑问》一文，载1935年《清华学报》第十卷第一期。

一种认为：李白之家世或本商胡，入蜀之后，以多资渐成豪族。见詹锳《李白家世考异》一文，载《李白诗论丛》一

书，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一种认为：李白先世是突厥化的中国人。见胡怀琛《李太白的国籍问题》一文，载1936年《逸经》第一期。

一种认为：李白先世是凉武昭王后裔李达摩后一代，即李渊从兄弟行。李白与唐帝王同出近祖。见麦朝枢《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增刊1958年第六辑。

一种认为：李白是汉人，但出生于中亚碎叶城。李白的父亲是从西域归来的富商。见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。

一种认为：李白是李建成之后，玄武门之变后，建成死难，其妃子将李白之先祖救出，在李渊保护下，逃往西域。见褚问鹄《李白身世的研究》一文（其文主要介绍台湾学者罗香林先生说法），载《台湾艺文志》。

以上每种说法皆有赞成者，亦有反对者，或兼而有之者，于是形成众说纷纭局面，迄今仍尚无定论。

窃以为：李阳冰、范传正等人记载以及李白本人诗文所述皆多有难解之处，正因其有难言之隐不欲人知，故吾人在李白家世问题上只能碗大汤宽，求大同而存小异，否则治丝益棼，恐有歧途亡羊之虞。

破解李白家世之谜并非研究李白之目的，而是用以达到知人论世之手段，或可为认识李白生平与创作之助，最后还须回到李白其人及其诗。

有能破解李白家世之谜，用以解决其生平行事真相及诗作真谛者，功莫大焉。

由于李白家世难明，其生年、生地亦皆有异说。生年有二说：一说生于武后圣历二年（699），宋薛仲邕《李太白年谱》

主之；一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亦即大足元年（701），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主之。今人多宗后说。生地亦有二说：一说生于蜀，一说生于西域。中亚碎叶说曾定于一尊，今则多宗前说，生于蜀中矣。但生蜀之说亦非定论，因李白诞生之年——长安元年（701）与其家归蜀之年——神龙元年（705）互相抵牾，似此，其家归蜀时，李白已五岁，说不可通。王琦因疑神龙为神功之误。虽有可能，毕竟尚欠实据。

虽然李白出生地尚有争论，但以之为蜀人却属一致。其故里为唐代剑南道绵州（巴西郡）昌隆县（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县），亦无异议。昌明县，五代以后改为彰明县，今已并入四川江油县。彰明县旧有清廉乡，后改为青莲乡，相传李白旧宅在此，已废为僧房。见北宋时杨遂所撰《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》文。该碑石今已移至江油县城内李白纪念馆。

二、少作甚多，兼好剑术，又慕神仙

中宗神龙元年（705），李白五岁，发蒙读书。见其后所作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：“五岁诵六甲”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“八岁入小学，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。”六甲，即六十花甲，以天干地支相配而成，古代小学识字课。

睿宗景云元年（710），李白十岁，学习《诗》《书》及诸子百家。见《新唐书》本传：“十岁通《诗》《书》”。亦见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：“十岁观百家”。其后所作《秋于敬亭送从侄崱游庐山序》云：“余小时，大人令诵《子虚赋》私心慕之。”当亦十岁前后事。

其所作诗文中屡称“十五”之年：如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

凌相如”（见《赠张相镐二首》）；“十五学神仙，仙游未曾歇”（见《感兴八首》其五）；“十五学剑术，遍干诸侯”（见《与韩荆州书》）。诸句中所谓“十五”当是指十五岁前后而言。由此可知，李白在十五岁前后已开始写作诗赋，学习武艺，并接受道教影响。

关于李白少作，《唐诗纪事》引杨天惠《彰明逸事》云：“时太白齿方少，英气溢发，诸为诗文甚多，微类《宫中行乐词》体。今邑人所藏百篇，大抵皆格律也。虽颇体弱，然短羽襍襍，已有凤雏态。北宋淳化中，县令杨遂（江南人）为之引，谓为少作是也。”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在引用上述文字后按云：“疑《文苑英华》所载五律数首，或即是欤？”并以之入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三十“诗文拾遗”，计有《初月》《雨后望月》《对雨》《晓晴》及《望夫石》共五首。除《望夫石》外，诸诗均写故里风光，其特色确如杨天惠所云。杨天惠（东蜀人），北宋元符二年彰明县令，去唐未远，其《彰明逸事》又系访之邑人，当非无稽之谈。王琦深于李诗，以诸诗或属少作，大致可信。

兹录《初月》一首如下：

玉蟾离海上，白露湿花时。云畔风生爪，沙头水浸眉。乐哉弦管客，愁杀战征儿。因绝西园赏，临风一咏诗。

玉蟾，指月，古代神话谓月中有蟾蜍。玉，饰词。“云畔”二句形容初月之状：上句仰望空中，下句俯视水际。弦管客，指行乐之人；战征儿，指戍边之士。杀同煞，甚词。二句意谓：行乐之人因月而益增情趣，戍边之士则望月思乡而不胜愁

苦矣。西园，本是铜雀园之别称，为曹操父子及当时文人宴集之地，后世成为佳园林之代称。二句意谓：因念及戍边战士之苦，故谢绝游乐而临风咏诗也。

近有海外学人黄秉炜先生，从〔英〕翟理斯教授（1845 - 1935）《英译中国诗歌选》（1898年版）中，竟又发现《萤火》一首。其原文云：“雨打灯难灭，风吹色更明。若飞天上去，定作月边星。”其下注云：“十岁即席之作”。此诗意象新奇可喜，风貌与上述少作亦略似。翟理斯曾任驻华使节三十年，此诗当有来源，惜未注明出处。是耶非耶？姑录于此，以俟高鉴。

集中《拟恨赋》亦当是此期少作。王琦于题下注云：“古《恨赋》，齐梁间江淹所作，为古人志愿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。太白此篇，段落句法，盖全拟之，无少差异。《酉阳杂俎》：白前后三拟《文选》，不如意辄焚之，惟留《恨》《别》赋。今《别赋》已亡，惟存《恨赋》矣。”此赋段落句法，确系全拟江淹，惟妙惟肖。果然英气溢发，俨然“壮夫”。或作于弱冠前后。

关于李白少好剑术，喜任侠事，其本人诗作中多次述及，当时人文章中亦有记载。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谓白“少任侠”，范传正《李白新墓碑》亦谓白“少以侠自任”。李白开元中所作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有句云：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。却秦不受赏，击晋宁为功？”缪本此下尚有“托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”二句。“杀人”云云，或系夸张之辞，然其少年习武任侠行径于此可见。

关于李白少慕神仙事，亦屡见于其诗文中。《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》有句云：“家本紫云山，道风未沦落。”王琦注

云：“紫云山在绵州彰明县西南四十里，峰峦环秀，古木樛翠。地理书谓常有紫云结其上，故名。……有道宫建其中，名崇仙观。观中有黄篆宝宫，世传为唐开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置于此。”可见紫云山为当时道教名山。唐时尊崇道教，蜀中道风颇盛，故李白早在少年时期即受其影响。《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》云：“吾与霞子元丹，烟子元演，气激道合，结神仙交，殊身同心，誓老云海，不可夺也。”其中“霞子元丹”即道士元丹丘。元丹丘与李白结交早在“弱龄”，李白出蜀后不久即已称丹丘为“故人”^{*}，可见二人或系在蜀中相识。唐时“道门龙凤”多在幼年或少年即入道，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诗中之道士疑即丹丘。

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全诗如下：

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露浓。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。野竹分青霭，飞泉挂碧峰。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。

戴天山，或云即大匡山，在昌明县北三五十里。光绪重修《江油县志》云：“戴天山在匡山之顶”。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授蒋志，近年曾偕江油李白纪念馆同仁进行实地调查，谓戴天山在大匡山后更高处，其顶峰海拔已达 2100 公尺。详见所著《李白蜀中论考·戴天山考察记》。

开元六年（718），李白十八岁。读书匡山，并往来旁郡。见《唐诗纪事》卷十八引《彰明逸事》：“太白……隐居戴天、大匡山，往来旁郡。”大匡山在唐时有大明寺，今遗址犹在山

* 语见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。

腰，即白读书处（详后）。

往来旁郡，前后约有三次。其一为江油之旅：古江油县为龙州（江油郡）治所，在昌明县北。所经道路即三国时魏邓艾征蜀之阴平道，山高谷深，至为艰险。白当有诗，恐已散佚，今唯有《赠江油尉》一首。其二为剑阁之旅：剑阁，即大剑山之阁道，在昌明县东北剑州（普安郡）。其山峭壁千丈，下瞰绝涧。诸葛亮相蜀时凿石架梁为之，以通行旅。其后白之《剑阁赋》《蜀道难》诸作，当赖此行之助。其三为梓州之旅：白在弱冠前还曾南去梓州（梓潼郡），从赵蕤学习一年有余。赵蕤，字太宾，梓州盐亭县人，隐于梓州郪县长平山之安昌岩。博考六经及诸子同异，著《长短经》十卷，明王霸大略。开元中屡征不就，故称“赵征君”。《北梦琐言》《四川通志》《舆地纪胜》诸书均有记载。《彰明逸事》并称其“任侠有气，善为纵横之学”。按《长短经》一书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作《长短要术》，归入“杂家类”。其书至今犹存，共六十三篇，上自“君德”“臣行”“王霸”，下至“是非”“通变”“相术”，旁及“出军”“练士”“教战”……均以六经为基础，博采诸子百家，并结合历代史事，针对近世弊政而发。虽是杂家之言，亦有纵横之术。意在干谒帝王，经世致用。李白后来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所云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”，此种思想显然即由此而来；《答孟少府书》中又云：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，然后与陶朱、留侯浮五湖，戏沧洲，不足为难矣。”则又兼有儒家“事君”“荣亲”思想与道家“功成身退”思想。

总而言之，李白在少年时期已开始形成他远大政治理想与特殊从政方式，即以布衣直抵卿相，匡君济世，然后功成身退。

三、出游成渝，初事干谒

开元八年(720)春，李白二十岁，出游成都，并谒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。

后作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记其事云：“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，白于路中投刺，待以布衣之礼，因谓群僚曰：‘此子天才英丽，下笔不休，虽风力未成，且见专车之骨。若广之以学，可以相比如肩也。’”据两《唐书·苏颋传》及《通鉴·唐纪》，开元八年正月，宰相苏颋罢为礼部尚书，“俄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”，故知李白游成都谒苏颋事当在该年春。李白谒苏颋时，当曾献有大赋，故颋谓之“下笔不休”。此前所作《明堂》《大猎》二赋，或即是欤？杨慎《丹铅总录》卷十二引苏颋《荐西蜀人才疏》云：“赵蕤术数，李白文章。”可见李白不仅受到苏颋赞扬，而且受到苏颋推荐，但无结果。其原因在以后各章中将会逐渐呈现。

《登锦城散花楼》一诗当作于此时。诗云：

日照锦城头，朝光散花楼。金窗夹绣户，珠箔悬银钩。飞梯绿云中，极目散我忧。暮雨向三峡，春江绕双流。今来一登望，如上九天游。

此诗“极目散我忧”一句，使全诗在酣畅游兴中微露失意痕迹，或即因干谒无成之故。

李白游成都后并未返里，而有渝州之行。当时名士李邕适为渝州刺史，此行必是谒邕。《上李邕》《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》二诗当作于是时。

《上李邕》诗云：

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抟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沧溟水。时人见我恒殊调，见*余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
此诗詹锼系于天宝五载（746），其下注云：“钱谦益《少陵年谱》于天宝四载下注云：‘李邕为北海太守，陪宴历下亭，李白、高适均有赠邕诗，当是同时。’据钱说当是天宝五载夏间于济南作。萧士赉曰：‘此篇似非太白之作。’朱谏曰：‘按李邕于李白为前辈，邕有文名，时流推重，白至京师，必与相见，白必不敢以敌体之礼自居，当从后进之列。今玩诗，意如平交，且辞意浅薄而夸，又非所以谒大官、见长者、待师儒之礼也。白虽不羁，其赠崔侍御、韦秘书、张卫尉、孟浩然等作，辞皆谨重而无褻慢之意，次及徐安宜、卢主簿、王瑕丘、韦参军、何判官等，虽有尊卑之殊，各尽欢洽之情，无有漫辞，矧李邕乎？以此益可疑矣。’按钱氏绛云楼藏有《李翰林草堂集》，当是未经乐史及宋敏求增订之本，李集板刻，此为最善。钱氏所为《少陵诗笺》及《年谱》，亦最审慎。今钱氏既称白有赠邕诗，则此首或见于古本，不致为伪作也。且朱谏以诗为白在京师作，按白游长安时邕方为灵昌太守，必无相见之理。朱氏亦失之不考。”（《李白诗文系年》）詹氏辨别此诗真伪之说，良是。萧、朱二氏以此诗为伪作，大愤。然詹氏系此诗于天宝五载（746），李白四十六岁时，亦未谛。

窃按诗中既有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”之

* 霏玉本作“闻”。

语，自应是早年所作。正缘作时尚是年少后生，初入世途，未谙“谒大官、见长者、待师儒”之礼，又兼年少气盛，如初生之犊，故于李邕敢以敌体之礼自居，如语平交然。若谓作于天宝五载，时白已年近半百，何能自称“年少”？且已富于阅历，又何至唐突若是？天宝五载夏，白与李邕及杜甫、高适相会于济南时，作有《东海有勇妇》一诗，中有句云：“北海李使君，飞章奏天庭。舍罪警风俗，流芳播沧瀛。”于邕之德政颇加揄扬，对邕之态度与此诗迥异，其非同时之作甚明。

又按李邕开元初叶曾为渝州刺史（此事两《唐书》本传皆失载），见《通鉴·唐纪》：开元六年十一月，“宋璟奏：括州员外司马李邕、仪州司马郑勉，并有才略文词，但性多异端，好是非改变。若全引进，则咎悔必至；若长弃捐，则才用可惜。请除渝、硤二州刺史”。又见《金石萃编》卷七十一《修孔子庙碑》（今碑石犹存，在曲阜孔庙），碑末文云：“朝散大夫持节渝州诸军事守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文”；开元七年十月十五日立”。似此，开元八年李邕当在渝州任上。

再看《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》一诗：

桃竹书筒绮绣文，良工巧妙称绝群。灵心圆映三江月，彩质叠成五色云。中藏宝诀峨眉去，千里提携长忆君。

“桃竹”为巴渝特产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云：“于东则左绵巴中……其中则有巴菽巴戟，灵寿桃枝。”刘渊林注：“桃枝，竹属也，出垫江县，可以为杖。”汉垫江县，唐为石镜县，属合州，与渝州相邻，县南九里之铜梁山，出桃枝竹（见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三）。杜甫有《桃竹杖引》，苏轼跋云：“桃

竹，叶如棕，身如竹，密节而实中，犀理瘦骨，盖天成竹杖也。出巴渝间。”《杜臆》：“桃竹即棕竹，川东至今有之。”桃竹既为巴渝特产，则题中之宇文少府当为巴县县尉；亦唯有如此，方与诗中“千里”二句相符，渝州距西蜀可谓千里。

由此可知，李白在游成都之后，登峨眉山以前，必有渝州之行，其谒李邕及《上李邕》之作即在此时。

《登峨眉山》一诗当作于游渝州之后。诗末有句云：“烟容如在颜，尘累忽相失。恍逢骑羊子，携手凌白日。”骑羊子，谓仙人葛由。王琦注：“《列仙传》：葛由者，羌人也。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。一日骑羊入西蜀，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。山在峨眉山西南，高无极也。随之者不复还，皆得仙道。”凌白日，凌跨白日，意即飞升成仙。此种出世之情，显然是因为前此在成、渝二地干谒无成所致。每次干谒活动失败以后，皆不免有出世之思，此在李白一生中屡见不鲜，但皆一时之情绪耳。

四、习业养性大匡山

开元八年（720）冬日，李白始返昌明。《冬日归旧山》一诗当作于此时。诗云：

未洗染尘缨，归来芳草平。一条藤径绿，万点雪峰晴。地冷叶先尽，谷寒云不行。嫩篁侵舍密，古树倒江横。白犬离村吠，苍苔上壁生。穿厨孤雉过，临屋旧猿鸣。木落禽巢在，篱疏兽路成。拂床苍鼠走，倒篋素鱼惊。洗砚修良策，敲松拟素贞。此时重一去，去合到三清。

此诗王本《诗文拾遗》录自《文苑英华》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谓此及《初月》等诗为“晚唐人语”，因疑为伪作，未谛。李白少作多属律诗，《彰明逸事》早有记载。其所以如此，乃因当时风气使然。《新唐书·宋之问传》云：“魏建安后迄江左，诗律屡变，至沈约、庾信，以音韵相婉附，属对精密。及之问、沈佺期，又加靡丽，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如锦绣成文。学者宗之，号为‘沈宋’。”李白少时，正是“沈宋”体流行之时，自然受其影响。因此，李白《冬日归旧山》等诗并非晚唐贗作，而是“沈宋”诗风影响之产物。但李白少作与“沈宋体”一开始就是貌合神离，并无“沈宋”之靡丽，而别有一种清新气息。

再则此诗又可证之于江油李白纪念馆藏宋神宗熙宁元年《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》碑。碑文有云：“太白旧山大明古寺，靠戴天之山……□唐而兴建，鱼鼓喧阗，迄我宋而葺修，钟梵鞀响，仅五百载……昔贞观中始祖师法云，不知姓氏，号长眉僧，卜基此宅。”又云：“唐第七祖玄宗朝翰林学士李白，字太白，少为当县小吏*，后止此山，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平有十载。”此碑原在江油县匡山大明寺遗址，故《四川通志》称之为“匡山碑”。碑文中既以大明寺为“太白旧山”，则诗题中之“旧山”当即匡山。或诗题本为“冬日归匡山”，宋时讳改。诗中所写之景物，亦舍匡山莫属。李白其后寓居之安州、

* 李白少为县小吏一事之有无，今人意见分歧。阎琦谓为当系其父之“短视行为”：唐时县小吏地位卑下，由此出身者最受歧视，其父盖望子成龙心切，结果适得其反（见《李白入仕道路及其幽愤》）。阎说可供考虑。至于相传为县小吏时所作诗，轻浮庸俗，与《文苑英华》所载少作绝不相类，不可信。

兖州等地，均无“一条藤径绿，万点雪峰晴”之景。此“万点雪峰”即岷山诸峰，俗称雪山，在昌明县西北之松州、龙州境内。《元和郡县志》龙州江油县：“雪山，在县西三百里。以春夏常有积雪也。”似此，则诗中所云“归来芳草平”，当即碑文中所云“乔松滴翠之平”。“平”通“坪”。故知《冬日归旧山》当是开元八年李白游成、渝二地归来之作。

此诗中“洗砚修良策，敲松拟素贞”之语，当是从苏颞“广之以学”之教，以山中之松自励，决心发愤读书，以图再起。诗末又云：“此时重一去，去合到三清。”三清，即玉清、太清、上清，本系道家语，谓天庭、仙界。然李集中多以天庭、仙界喻朝廷、帝京。范传正《李白新墓碑》谓白“常欲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”，此诗末二句即隐有此意。

此后三年间，李白大概一直皆在匡山读书。《中和大明寺住持记》所云“读书……十载”，当是以弱冠前后时间合而计之，亦是举成数而言。《彰明逸事》谓白“少时隐居戴天、大匡山”，实是寄居匡山大明寺发愤读书，以期用世。

其后所作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所云：“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，白巢居数年，不迹城市，养奇禽千计，呼皆就掌取食，了无惊猜。广汉太守闻而异之，诣庐亲睹。因举二人以有道，并不起，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。”长期以来，多将此事与李白前此师事梓州赵蕤混为一谈，实则东严子另是一人。范成大云：“岷山之最近者，曰青城山；其尤大者曰大面山；大面山之后，皆西戎山矣。青城，实岷山第一峰。”（见《吴船录》卷上）。故知李白所谓“岷山之阳”乃青城山，南距成都仅百里。“逸人东严子”当系青城山之隐士，其人虽不详，但并非赵蕤可知。自亦是蜀中事迹，所谓巢居数年，则漫

言之耳。

唐自则天朝以后，学官日衰，士人读书山林寺院者蔚为风尚。其所以如此，盖经学衰而文学盛。经学重师承，文学尚性灵。学官既衰，士人势必散处四方，择山林寺院幽胜之地以为养性习业之所*。由此可知，昔人所谓李白隐于某山，寄居某寺者，实则多为陶冶性灵并潜心习业，以图进取也。

五、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

开元十二年（724）春，李白二十四岁，去蜀远游，临行有《别匡山》一诗。其后所作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云：“以为士生，则桑弧蓬矢，射乎四方。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。”《别匡山》一诗即其去蜀之初辞乡之作。此诗历代李集皆失载，仅见于《中和大明寺住持记》碑及《彰明县志》《江油县志》。志文与碑文稍有出入。碑载此诗无题，题始见于县志。《四川通志》称之为“出山诗”。兹录全诗如下（文据宋碑）：

晓峰如画参差碧，藤影摇风拂槛垂。野径来多将犬伴，人间归晚带樵随。看云客倚啼猿树，洗钵僧临失鹤池。莫怪无心恋清境，已将书剑许明时。

全诗八句，前六句皆写匡山“清境”，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，亦即远游之目的。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，既对故乡无

* 详见《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》之《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》一文。台北市联经版。